

《大唐西域记》在日传承问题

[日] 高田时雄 文 裴亮 译

《大唐西域记》是中国唐代高僧三藏法师玄奘在结束了他历时十七年的印度求法之旅返回长安之后,奉太宗皇帝之命而撰写的一部著作。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抵达都城长安,彼时恰逢太宗因征讨高丽之故而暂离长安,会兵于洛。为军事备战而百般忙迫之中,太宗在洛阳的仪鸾殿诏见了玄奘,并以“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覩,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为名鼓动他撰写一部西域游记。亲受皇命所托的玄奘返回长安之后,旋即在弘福寺开设译经处,着手翻译从印度携回的佛经典籍。与此同时,尽快完成记载西域旅行见闻的游记编撰工作也变得迫在眉睫。

作为便宜之计,玄奘决定委任以缀文大德(从事将直译体经文改写为精炼汉语工作的僧侣)的身份参与到译经工作的青年才俊辩机和尚来执笔为他撰写草稿,而所有的内容和素材自然皆由玄奘亲自提供。可以想见的是,材料中可能既包括玄奘本人的日记,也包含一些他从梵文文献中摘录的片段等内容。在《大唐西域记》的所有传本中,几乎各版本的卷头皆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的记载。虽然,这通常被认为是由于《大唐西域记》与玄奘所译的其它众多佛经典籍一同被收入佛典目录之中而被误记所致。然而,其背后事实上还隐藏着这样一段因果原由。

尽管如此,十二卷《大唐西域记》的编撰最终经由玄奘的修订而得以顺利完成,并很快于次年的贞观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被进献给太宗皇帝。然而,由于这部著作乃是仓卒之间编就,在文字表现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在十年之后的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命令时任宰相的于志宁等大臣对新译佛经的不妥之处进行修改润色之际,也顺带对《大唐西域记》进行了少许字句的修正。后世所传大藏经刊本的文本也都源自此次的显庆改定本。

此外,也有迹象显示在唐代,最起码在当时的长安僧侣之间,曾广泛地流传着卷帙浩繁的《西域记》文本。这是因为我们在曾供职于玄奘译经处的玄应、道宣等同时代僧侣的著作里所引用的《西域记》文本之中,能够找到颇多现行的《西域记》中所无法见到的文字片段。笔者推测这些文本的真相很可能是辩机所撰写的《西域记》的初稿本,也就是所谓的未经玄奘删改的“长编”。如果不作此推测的话,则无法解释说明这些现行本中所见不到的文本的存在。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辩机便因与太宗的第十七女高阳公主私通获罪而被处以酷刑,辩机的《西域记》初稿也因其罪人身份而未能传世。

二

那么,《大唐西域记》具体是何时传到日本,所传又究竟是何种版本呢?日本飞鸟时代的白雉四年(653年),道昭作为遣唐使之一出使大唐。他因

作者简介:高田时雄,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第三课程言语学博士。1983年起任教于京都大学,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名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写本的言语史研究,在敦煌写本研究、藏汉对音资料研究、维语字音研究以及汉语音韵史研究等领域有重要学术贡献。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东洋学丛书33,东京:创文社,1988)以及《敦煌·民族·语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等。

遣唐期间曾师从玄奘,归日后又成为开创日本法相宗的祖师而为世人所知。道昭于文武天皇四年(700年)圆寂离世,而据《续日本纪》所记载,他曾深得玄奘喜爱并与其同屋生活起居。且在他归日之际,玄奘将其所藏全部舍利经论都赠予了道昭。而这批经论中是否包括了《大唐西域记》虽没有明文说明,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不可否认道昭将作为玄奘代表著作的《西域记》也一同带回日本的可能性却非常之高。退而言之,如果即便此时《西域记》未被道昭携带来日,那么在随后的天平七年(735年)玄昉返日带回经论五千余卷之时,《大唐西域记》位列其中必是毋庸置疑。此外,从正仓院文书中在天平十一年(735年)间留存着关于《大唐西域记》的写经纪录这一事实来看,我们也可以确认《大唐西域记》在该时期内确已然传至日本。

问题在于,此时期写本所依照的底本到底是何种文本?究竟是玄昉所携回的新版本,抑或是可以追溯到道昭时期的旧版本。天平十一年的写经纪录并非对全十二卷皆有记载,其中卷二、五、八、十一这四卷是缺失状态,而另外八卷全都各自标有用纸的张数。八卷所有纸张数合计191张,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数量应为全十二卷总量的三分之二,因而简单推算的话,全十二卷则大约有287张。需要顺带说明的是,依据收录了截至开元十八年(730年)为止所译大藏经之目录的《开元释教录》所记载,《西域记》的用纸数量为234枚,显然与前文推算数量不符。一般而言,由于佛教典籍的抄写与用纸都有极其严谨的规格,所以如果认同普遍观点即玄昉携回日本的大藏经为《开元释教录》所收的全部经典的话,那么天平十一年用于抄写佛经的底本则不可能是玄昉所携回的版本。

众所周知,日本仍留存着为数众多的《大唐西域记》古写本。当然,其绝大多数都并非以单行本存世,而是作为大藏经的一部分而得以流传。如果将这些版本与被视为以中国最早的大藏经刊本《开宝藏》为蓝本复刻而成的高丽本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能看出一些非常明显的不同点。比如在高丽版中,含有“闻诸先志”这一短语的字句(总计二十

处),在日本的古写本中却时而被写作“闻诸土俗”,时而被写作“闻诸耆旧”,并且“诸”字还多被写作“之”字,参差不齐,较为凌乱。这大概源于日本的古写本多保留古本形态,而高丽版则是依据某种基准经过了整理的文本。与此相反,我们很难认为参杂了各种文字的日本古写本是从文本具有高度统一性的高丽版演变而来。

言及高丽版的版本问题其情况则稍显复杂。此版本体系包括有高丽王朝显宗时代(1010~1031年)的初刻本。此外,在初刻版的雕版在与蒙古的战火中被付之一炬之后,高宗当政之后发愿再度重刻,并最终于高宗三十八年(1251年)竣工完成,推出了复刻版。现今残存下来的六卷初刻本《西域记》之中,针对“闻诸先志”这一字句所出现的其中四卷(卷六、七、八、十)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这些问题字句和复刻版中的完全一致。据此,笔者认为日本古写本一类的文本乃是比前文所言及的显庆改定本更早的版本,而高丽版一类的文本则是经过“润色”的结果。正因如此,日本古写本的《大唐西域记》传承了玄奘原著的原初状态。

三

话虽如此,笔者所能实际见到的日本古写本主要为以下几种。首先不得不提及的乃是京都兴圣寺藏本,其卷一有延历四年(公元785年)书写的题记,虽然关于这个题记的可信度仍存有争议,但此藏本乃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西域记》文本。接着要提到的是现在收藏于御茶水图书馆中的成篔堂库本,虽然该本只有卷十存世但题写有长历五年(1041年)的纪年。守屋孝藏旧藏的京都国立博物馆本(只有卷一)则有康和四年(1102年)的题记。流传至法隆寺的版本仅有十卷而缺少卷二与卷十,乃是大治元年(1126年)的抄写本。一般认为所缺的卷二和卷十乃是在明治时期流出寺外。值得庆幸的是卷二很快被京都的神田家收藏,现在则归大谷大学所有。石山寺的大藏经藏本虽十二卷一应俱全,但卷一至卷八乃是长宽元年(1163年)的抄写本。河内金刚寺藏本欠缺卷一和卷十,题写有保延五年

(1139年)抄写的纪年年号。名古屋的七寺大藏经藏本残存卷一至卷三、卷五至卷八总计七卷,是治承二年(1178年)的抄写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西域记》是松本文三郎的旧藏,十二卷本保存完好。而从各册卷首皆印有“橘寺”之墨印,封面上题有“持宝院长弘”的署名这些特征来看,此藏本原本乃是飞鸟的橘寺所藏之典籍,镰仓以降才被转移到东大寺。“持宝院长弘”正是十六世纪中叶永禄年间东大寺的僧侣。此藏本虽无纪年可查,但一般都认为是镰仓时代、十三世纪初期抄写而成。中尊寺所藏金银泥字藏经是极具艺术价值的珍稀文化遗产,其中的十二卷西域记现已尽数变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均是十二世纪由奥州藤原氏所抄而成。此外,京都的醍醐寺中藏有建保二年(1214年)添加了训点的卷十一和卷十二。

综观这些平安、镰仓时期的诸版本,其中存在疑问的“闻诸土俗”和“闻诸耆旧”这些字句达到了彻底一致的程度。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日本古写本的《大唐西域记》乃是依据一个共同的祖本而被不断辗转抄写而成,而这一祖本保留有《西域记》的原初形态。从敦煌的藏经洞中得以出土重见天日的大量古写本中,也有一些《西域记》的残卷被发现。而其中的一部分正如笔者所预料也是属于同一古老体系的藏本。然而,在日本境内流传着如此为数众多且不乏十二卷齐备的藏本,我们不得不为之感到自豪。

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是记录了九世纪末期日本所存汉籍的总目录,在其中的“第二十一土地家”分类中有“西域记十三玄奘撰”的记录。这里的“十三”应该指的是“十三卷”,何以凭空多出一卷则无从可考。但由于这本目录本身卷数记载错误的失误频频发生,因而这里的“十三”大概也可以认为是单纯的书写错误。无论如何,在这本不收录佛教典籍的目录中却有《西域记》的相关记录这一事实本身,就喻示着《西域记》不是被作为大藏经的一部分,而是被视为与地理相关的单行本著作在寺庙以外的场合也被广泛阅读的可能性。敢于只身远赴西域印度拜求佛法的玄奘所

写的游记见闻,应该会给古代日本人带来宏大的异域想像。而到九世纪末期,也开始出现如高岳亲王等试图尝试西天取经求法的人物。由此可以想见,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已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日本社会。

四

在中国,从《开元释教录》问世之后,《大唐西域记》不论是写本还是刻本都会被收入大藏经。而《西域记》能够以完整的形态流传至今,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很早就以这样编目形式得以很好的整理和收藏。而另一方面,宋代之后《西域记》却乏人问津,不再被广泛阅读。虽说被收入大藏经对《西域记》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也使它仅仅作为经卷在寺院中被束之高阁,而一般读书人接触和阅读它的机会则变得越来越少。

此外,最早将《西域记》从大藏经中摘出作为单行本印刷出版的,是明末万历年间在徽州府(治所在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经营书肆西爽堂的吴琯。但是,这一版本并未得以广泛流传。直到又称方册藏经的《嘉兴藏》的版本面世,《西域记》的单行本才变得较易入手。这一版本是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丙戌年(1646)由嘉兴府(今浙江省嘉兴市)的楞严寺刊刻的。《嘉兴藏》是应民间对佛教经典的需求而分开出售,同时也采用了便于翻阅的普通线装书装帧,可以想见是比较受欢迎的本子。清朝中叶以降,嘉庆年间张海鹏的《墨海金壶》、道光年间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也都曾收录《西域记》,从而为普通人接触这一经典创造了更多机会。

与中国相比,日本对《大唐西域记》的需求似乎要多得多。宽永的古活字版之外,还有宽永二十年(1643)刊行的庄太夫刊本。古活字版采用的底本是崇宁二年(1103)的福州等觉禅院本,而庄太夫刊本则是这一版本的整版翻刻。这一版本的版权此后移交给中野五郎左卫门,并于承应二年(1653)再次印刷,甚至秋田屋平左卫门、丁子屋九郎右卫门等京都书肆也曾具名刷印,它的木版现今还保存在京都的贝叶书院。而在日本流传开来的还不仅仅

是上述单行本的《西域记》。正如秃氏祐祥所介绍的,镰仓时代之前日本就已经有过和译《西域记》的尝试。《今昔物语集》中取材于《西域记》的故事也并不鲜见,由此可见,日本对《西域记》有着相当广泛的接受。

五

此外,《大唐西域记》开始为世界所注目,无疑是源于十九世纪欧洲人对这一文本的关注。西域记最早刊行的欧洲译本是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的法语译本(1857—58年)。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的俄语译本(1845年)虽然较之早了十年以上,却可惜未能付梓出版,始终以稿本形态沉睡在俄罗斯科学院的档案馆。英文译本中最早出现的是比尔(Samuel Beal)的译本(1884年)。并非完全忠于原文的译法虽然有些欠缺,但不久之后更为精准的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译本(1904—05年)就面世了。

欧洲大陆对于《西域记》倾注了深刻的关心,而这种关心主要源于它提供了关于伊斯兰化之前古中亚与古印度的最为详尽的情况。以巴黎为据点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最先指出了《西域记》在这一方面的历史价值,却由于未能得到《西域记》的原文而未能着手进行全文的翻译工作。

其后,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英国与俄国兴起了向印度与中亚派遣探险队的热潮,于是《西域记》成为了绝佳的参考用书。俄罗斯的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和英国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旅行包里塞满了《西域记》;英国考古学者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对印度的发掘活动中,《西域记》也起到了指南书的作用。

《大唐西域记》在欧洲获得的高度评价反过来对日本与中国学界形成了刺激,这种态势无疑导致了两国对《西域记》的重新审视。丁谦的《大唐西域

记地理考证》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研究性著作,其主要研究方向是《西域记》中的历史地理,但其刊行于世则晚至民国初年(1915年)。明治以降,在欧洲的影响下,日本学者也提高了对《西域记》的关注度。幕末、明治初期的博物学者栗田万次郎著有《西域记略》,刊载于明治17年(1884)的《东京地学协会报告》。虽然确实如文题所说记述相对简“略”,但是该文为玄奘从出发开始到回国为止所途径的各个重要地点都附上了具体的日期行程,又添加了地名的英文标记,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研究成果。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西域记》的研究正是以此为滥觞。

到了明治末年,羽田亨《大唐西域记》的校订本与考异问世(也就是所谓的京大本,1911年刊)。这一校本以高丽版为底本,广泛参考了宋、明版大藏经及日本的古写本。直到如今,在《西域记》的文本校勘中,这一版本仍然无可取代。只是在这一版本问世已逾百年的现在,可供参考的古写本数量也有所增加。如前文所说,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步推进,《高丽藏》之类《开宝藏》系统并不一定传承了唐代的正统文本,反而是日本的古写本更加接近唐本原貌这一事实也趋于明了。我们认为以日本古写本为底本,重新编制《西域记》新校订本的时机即将到来。

在日本,羽田校本刊行之后,陆续有堀谦德的大部头著作《解说西域记》(1912年)、小野玄妙的国译(亦即汉文原文的训读,1936年)、足立喜六的《大唐西域记研究》(1942—43年)、水谷真成的口语译文(1971年)、桑山正进的抄译(1987年)等等逐一付梓,这些都是各具特色的关于《西域记》研究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目前在日本还有不计其数的相关书籍也正不断出版问世,今后也将会有非常乐观的发展前景。可以肯定的说,日本是全世界最为关注《西域记》的国家。与古文本的存在相辅相成,对于《大唐西域记》而言,日本也一定是它的一大福地吧。

责任编辑:于亭